

▲顾 辉 著

Jiao Yu Guo Cheng Zhong De She Hui Jie Ceng Zai Zao

教育过程中的社会阶层再造

—— 一项对 H 市两所中学的比较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教育过程中的社会阶层再造

——一项对 H 市两所中学的 比较研究

顾 辉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MU LU



第一章 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研究的述评	(1)
一、国外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实证研究	(2)
二、国内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实证研究	(7)
三、教育获得的阶层背景：一项全国性的实证研究	(13)
四、研究视角：从高中阶段教育过程发掘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关系	(24)

第二章 基础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	(26)
一、教育的选择功能论	(26)
二、教育的再生产理论	(29)
三、学校作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布迪厄对法国教育场域的研究	(30)
四、核心概念：阶层与资本	(33)
五、研究框架	(38)
六、基本命题或问题	(40)

七、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说明	(41)
第三章 教育分层体系中的两所中学	(47)
一、教育分层等级中的两所中学——A 中学和 B 中学	(47)
二、学校的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57)
三、学校中无所不在的规训	(87)
四、本章小结	(98)
第四章 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	(100)
一、两所学校学生的社会阶层背景	(101)
二、家庭经济资本与教育获得	(104)
三、家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121)
四、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147)
五、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Logistic 回归分析	(155)
六、本章小结	(167)
第五章 学校教育与学生分化	(170)
一、学生班级分层的阶层含义	(170)
二、学校教育过程中的等级分类及其社会分层功能	(180)
三、本章小结	(206)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208)
一、主要结论和贡献	(208)
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12)
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25)

第一章 对教育与社会阶层 关系研究的述评

任何社会统治秩序都要面对和处理一系列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最主要议题就是在既定的社会秩序当中，社会上层是如何将已有的地位优势保持下来，并成功地应付来自下层的挑战和威胁；社会下层如何突破来自上层的限制和排斥，跻身社会中层和上层。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某一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建立和维护一整套的社会维持和转换体系，采取相应的技术策略，通过限制其他有能力的人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并使自己群体的社会报酬得以最大化，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社会封闭”（Parkin, 1974）。帕金（Frank Parkin）采用了韦伯（Max Weber）的这一概念，认为社会封闭策略通过社会团结和社会排斥两种方式技巧来贯彻。其中社会排斥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封闭方式，排斥的技术策略是向下施加压力，特定的群体通过使被排斥的社会群体“下属化”过程来维持或强化其特权，比如构建出另一个不合格的群体或阶层并使其处于自己的下层，而后者也一样成功地将剩余报酬和机会的获取向其他群体封闭。这样，通过层层排斥的方式，资源和机会在“不具资格”的群体中依次递减。与社会排斥相反，社会团结则是一种向上施加的策略。一般来讲，被排斥的群体缺乏法律或国家的支持，社会团结的努力主要依赖于被排斥群体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力，团结成功的话，意味着上层群体报酬份额的减少甚至是整体的剥夺（刘精明，2005：6~7）。

在社会封闭过程中，教育作为一种特殊而有效的社会团结和排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被广泛应用。教育作为一种选择机制，既作为社会排斥—团结的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这种选择机制的核心，则是社会精英阶层是如何通过教育这种手段限制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又是如何通过教育这种途径实现自身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社会下层又是如何突破这种限制获取有限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这里，教育过程被视为一种策

略，被应用于社会封闭的过程，从而在事实上为社会精英的选择机制蒙上了合法性，同时它也是一种隐蔽手段，在被统治者的主动参与中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本文的目标，就是通过对教育过程的细致考察，来发现社会阶层是如何在教育过程中再生产的。本文借鉴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考察了家庭如何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教育获得，学校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通过策略化的手段强化学生的阶层等级地位，并进而影响自身将来的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的过程。通过对教育过程的考察，发现家庭内部各种形式资本传递的途径以及学校这个场域内阶层排斥的运作机制及其方法和手段，以深化对教育过程的不平等的认识。

一、国外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实证研究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布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邓中和崔曼（Deng & Treiman, 1997: 390 ~ 409）指出，现代社会，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他们所获得的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的工业化或者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谁获得了教育机会，谁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最关键、最重要的机制。乔尔·斯普（Spring, 1976）把教育系统称之为社会的“筛选机器”。社会向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等级化的结构位置，即社会阶层位置，而教育制度对人们进行筛选之后把人们分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分层位置。可见，通过教育系统对人们进行的分层过程是整个社会分层至关重要的部分，人们在接受教育阶段所取得的教育地位影响到未来的职业地位，即教育获得影响或决定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因此，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分层的研究必然包含对教育获得与教育分层的研究，教育与社会阶层生产、再生产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应有之意。20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对日益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中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和英国的《盖洛登报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们使人们注意到并非学校质量而是儿童的社会出身背景对学业成绩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这两项报告的发表，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阶层背景与教育获得关系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流。

（一）教育是职业地位获得中介：布劳-邓肯的开创性研究

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 1967）是第一批对教育的社会阶层地

位转化功能的重要性进行经验研究的人。他们开创性地使用路径分析模型，把对社会流动研究的注意力由社会继承和流动的总量转移到塑造个人职业的一系列特殊事件上。他们以综合的社会经济指数（SEI）来表示个人的社会地位，将人们的职业变成一个可度量的定距变量，同时，他们将生命周期中的事件视为一条有时间顺序的因果链，个人地位实现的过程就在这一因果链中得以反映，在此基础上，他们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构筑了个人地位实现的基本模型。布劳首先将父亲的教育、父亲的职业、本人的教育、本人的最初职业、本人的目前职业作为与个人地位实现的基本变量，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美国，对一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要因素是本人的受教育程度（路径系数为 0.39），其次为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路径系数为 0.28），父亲职业对儿子职业直接影响比前两者要小（路径系数为 0.12）。不过，父亲职业对儿子职业的影响除直接效果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对儿子教育的作用而间接体现出来的。从路径图中看出，父亲职业对儿子教育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28，而父亲教育对儿子教育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31，也就是说，教育作为中介变量，维持着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职业的影响。这样，受过更高教育的父亲往往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接受年限更长的教育，从而保证了他们的孩子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这似乎表明，教育的功能是加强了继承而不是流动：中层阶层的儿子比工人阶层的儿子受教育时间长，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得到好一些的工作。在这一研究中，出身对教育的决定价值在 1/4。其后，费瑟曼（David Featherman, 1976）等学者的研究得出，出身对教育的决定值为 37% 左右。布劳和邓肯的模型同时还展示，父亲教育对儿子初职和目前职业均不具有直接影响，仅是通过对儿子教育的影响而作为间接效果予以体现。

布劳和邓肯的原始研究激起了一个在许多国家进行教育通向社会阶层地位研究的浪潮，这些研究详细地解释了教育在社会阶层代际之间转换的重要性。在研究过程中，布劳-邓肯模型在不断地完善，诸多因素作为因变量加入了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解释。其中包括马上要介绍的威斯康星州一个历史研究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模型。这些解释因素包括：（1）更精确地对父母亲资源进行测量；（2）在模型中增加了智力变量和学业能力变量；（3）增加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分析；（4）对家庭内和家庭之间的变量进行

了区分。布劳-邓肯模型的不断完善，也促成了其他研究者对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中东人口的不同样本进行的国别比较研究。尽管研究发现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别，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不同社会的研究中采用了相似的变量和相同的研究模型。

（二）教育阶梯上谁会掉队：来自于国别的比较研究

在职业专业化的现代社会，教育的迷惑之处在于它通过学校分流在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受教育者，只有一部分受教育者能够达到他所受过各种专业训练，能够大体上适应社会需要。在这里，教育以学业成绩为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过滤系统，在每一个水平上都会使一些“不合格的人”掉队，而另一些“精英”则被鼓励继续学下去，以满足获得相应职业地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但是，令人更为迷惑的是，哪些人在这种层层过滤中保持下来，哪些人在半途就掉队，仅仅是学业成绩在起过滤作用吗？

通常认为教育是获得高职业地位的途径，至少现代社会教育是实现收入增长的保证。但是，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是非线性的，现代国家保障的生存教育——基础教育与追求地位身份的地位教育——精英教育仍然存在鸿沟，上大学对于收入来说比上中学更具价值，尤其，如果一个人待在大学的时候长到足以使他得到一个学位的话，四年制的中学毕业生比小学毕业生的收入高出大约 40%；而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要比高中毕业生高出将近 50%（Jencks, 1979）。但是，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或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平等的，家庭背景既影响才能又影响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长短。由于家庭背景首先对于得到学位的机会会有很多作用，可以得出一个双重结论：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社会上层家庭中的人们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学生创造了条件。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展使人们特别是来自下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下层的人们通过获得大学学位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其实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是不同的。有关这方面多国研究归纳了五种结论（吉尔伯特 & 卡尔，1992）。

1. 高等教育的扩张剥夺了一般公众的社会选择机会，而弱势群体的选择没有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在吸收新生、就业安置上、高级服务阶层和专业服务阶层有紧密联系。这种情况反映了欧洲能人统治的本质，以及高校在扩张和庞杂的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穆勒（Muller, 1973）以英国

和法国为例，他认为，法国的选择体系给予了高级服务阶层和专业服务阶层的子孙——与其他社会背景的儿童相比，更好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在他所调查的几个国家中，服务阶层的子女在初等教育中仅占不到 10% 的比例，而在高等教育中却占到了 45% 以上的水平。

2. 计划经济的国家在阶级机会的分配上并不是最平均的，匈牙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将绝大多数社会机会给予了高级的社会阶层（Muller, 1973）。

3. 有两种教育体系普遍适用于承袭了欧洲大学教育体系的国家。第一种体系是提供条件、设施，让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完成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学习；第二种体系是通过社会选择进行淘汰。前者通常称为“赞助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认可的精英，按照精英的标准进行选择，英国通常是这种体制；后者是“竞争性选择”，按照统一的普遍化标准进行选择。这两种机制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一方面，扩展的高等教育政策不断地推动高等教育向着普及化、公平化发展；另一方面，选择机制的压力不断地改变学生的组成部分（特纳，1989）。

4. “在每一个连续的环节，有多少人能够继续读书？”不同的欧洲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早期的威斯康星州的研究（吉尔伯特 & 卡尔，1992）涉及 1957 年在上中学高年级的 9000 名学生，他们当中大部分被追踪到 7 年以后。研究结论是：男孩中 44% 已经上了某类大学，而女孩子中只有 31%。在男孩中，那些从低地位家庭中来的孩子仅有 21% 能够继续受教育，相对来看，那些从高地位家庭中来的孩子则高达 73%。但是，能力与地位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就能力最高的群体而言，他们中所有的人在智力上都能使他们继续上大学学习，但从最低地位层次来的最聪明的孩子中大约有一半人没能进入大学，而那些来自最高地位群体家庭的孩子则有高达 91% 的人进入大学。比较而言，在能力最低的孩子中，从低地位家庭来的孩子仅有 6% 的机会继续学习，而那些来自高地位家庭的孩子则有 39% 的机会。显然，地位和能力有着各自独立的影响，当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得到控制时，另一个变量依然能够产生大的差异。因而，那些在两个变量上均有着优势的人，几乎完全有保障能够上大学；而那些在两个方面均处于劣势的孩子，也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进入大学；那些在两个变量中占有一个优势的人，上大学的机会可能只有 40% ~ 50%。当然这种情况不尽相同，

穆勒（Muller，1973）在早期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双重模式。英国、瑞典具有相同的模式，德国、匈牙利、波兰则各不相同。其中法国和德国的差异最大：德国85%的学生都会在义务教育后继续读书，法国只有30%的比例，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获得学位证书。

5. 阶级选择有其独特性。穆勒（Muller，1973）认为：高级服务阶层已为其子女提供了优越的升学机会，进入英国的上流社会不仅仅依赖教育。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关研究被用来给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提供支持：首先，美国高等教育是如此庞大，如此开放，以至于为那些来自贫穷家庭有才能而又准备从事超过其父母层次的成功职业的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其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被充分地分了层，以至于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孩子中的每一代人复制出由他们父母所占据的社会地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促进了流动还是促进了继承呢？答案是：两者皆有。

教育社会学在后期对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时期的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讨论。1993年，Shavit和Blossfeld（1993）对13个国家教育获得的特征比较研究中发现，除了2个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在教育扩展与改革方面的努力，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特权阶层和劣势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差异，也就是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是普遍现象。同时，这种教育不平等的稳定性促使拉夫特瑞（Raftery，1993）等人提出了MMI^①（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的假设，它暗示，教育的扩张增加了低层次上各阶级参与的机会，但是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却出现了溢出效应，即促进了更高层次上弱势群体遭遇剥夺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说，学校的扩张与其说是降低了教育选拔的阶层不平等，还不如说仅是把这一过程往后推迟到了更高的教育层次上来进行。

（三）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转向

上述主导教育社会学界的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似乎都存在一个

① MMI理论的核心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持续增长的教育规模并不必然会改变家庭社会地位对人们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影响。第二，当受教育机会的快速增加超过了社会的总需求时，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程度不会减少。只有当较高层次的教育需求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或是说已经达到了该级教育水平的“最大化”，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入学机会的差异才可能减小。否则，入学机会的变化可能会是相反的情况。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找各种方式，使其子女教育机会最大化。

严重的不足，就是他们研究的是教育获得的结果，忽略了这种结果的学校课程机制和教学过程机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教育社会学的开展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得社会学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不断地深化。新教育社会学将葛兰西、曼海姆等人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引入了对课程的研究，认为课程的变化是知识定义的变化，这种知识的变化和社会分层、专门化以及知识组织的开放程度是一致的。教育知识传递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系统来实现，为此迈克尔·扬（2002）的“新课程理论”、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 1974, 1977, 1990）的“符码理论”以及布迪厄的“符号暴力”都开始关心社会阶级对知识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研究”为教育社会学教育获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直接启发本文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关系的研究。

二、国内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由平等到倾斜：教育分层的趋势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和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经历了几次大的、方向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与整个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紧密相连。社会分层研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教育阶层背景的把握，为我们展现了教育获得的时代变迁和历史特征，以便深入地理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教育之间关系。

教育普及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未带来我们所期望的现代教育体制公平合理的社会选择，家庭背景的因素干扰了教育选择过程的公平性。现代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期望尽量减少家庭背景的影响力，因此，评价教育体制、教育模式和教育地位获得的公平程度，就需要考察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力的增减程度。李春玲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及其年代变化的情况为我们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选拔机制的变迁，从经验层面上回答了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回归模型的 R^2 值和回归系数表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父亲职业、父亲学历、14 岁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成分四个变量可以解释 15.5% 的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同样四个变量对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可以提供 16.0% 的解释力；到 20 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四个变量的解释力下降到13.1%;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下降到最低点,为9.9%;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影响力猛增至17.9%。不论从家庭背景总体影响来看,还是从父亲职业的影响或父亲学历的影响来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持续减弱,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点,随后出现转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明显上升,达到50年里的最高点(李春玲,2005)。

张翼(陆学艺主编,2004:108~206)也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一步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地位获得的代际传承。他指出,1949~2001年,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一直比较显著。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获得教育的影响一直都很突出,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子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长。父亲的教育程度在1957年之后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一直起着正向作用;同样,从1957年之后城镇和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使得教育地位的获得越来越有利于城镇的孩子们。

李煜(2006)利用全国综合调查资料(CGSS)对教育获得与社会阶层背景关系的历时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在“文革”时期,社会整体上差异小,“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极大削弱了阶层的再生产之链,不过是以牺牲机会公平的绩效法则为代价。“文革”后,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体制恢复了以“高考”为标志的绩效原则,使家庭教育背景成为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代际继承的特征是文化再生产模式,教育不平等程度因此而扩大。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化加剧,阶层间社会经济差异扩大,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中管理阶层优势迅速增长,以及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机制被侵蚀,这意味着不平等的模式逐渐向资源转化模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转变。郝大海(2007)的研究也指出,1978年之前,由于国家教育政策干预对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教育需求的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个教育阶段之间的阶层差距;1978年以后,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中国教育分层显现出MMI假设的诸项特征:较高阶层在高中入学阶段具有稳定的优势,其中专业技术阶层在大学入学阶段保持

着较明显的优势。这表明,当前通过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来实现教育分层最小化的政策干预已经终结。但是,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倾斜教育资源的发展思路也未能如人所愿,它并未改变中下阶层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总之,国内社会阶层的教育获得实证研究较为一致地表明,改革前后,教育获得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由较为平等开始向社会优势阶层倾斜。

(二) 由阶层地位到教育地位:教育分层的机制研究

由家庭阶层地位到个人教育的获得,这条路径包含着多重复杂的影响因素。家庭资本数量及其构成、教育制度变迁以及国家政治安排等都会对个人教育地位的获得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视角来观察教育地位分布,必然包含对教育获得和分层机制的研究。

李路路(2003)利用1998年从北京、无锡、珠海三个城市的7337份问卷调查资料,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指出,相对于父辈为工人/农民,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对子代教育都有着正面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父代权力优势阶层的影响要强于其他两个阶层地位,父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要低于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也就是说,权力优势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自雇佣者的地位对于子代教育的获得呈现显著的副作用。相对而言,对于父代属于脑力劳动者范畴的人来说,自身的教育获得要受到父代社会地位的显著影响,而且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完全相反的作用。对于前者来说,教育显著表现出地位传递的中介性质;对于后者来说,它明显不具有代际地位传递的作用,并且对于子代相应社会地位来说也不具明显影响。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子代教育获得的模型,可以看到,相对于子代社会地位获得来说,子代教育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前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父代对子代教育在脑力劳动者阶层仍保持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于体力劳动者阶层来说,这种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1979年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影响最低,权力地位优势阶层影响居中。1979年以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变得最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次之,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变得最弱。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前

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增强。笔者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于教育机会保持着较强的干预程度。但是当教育机会的分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时，阶级阶层地位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笔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那么中国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将主要是以“教育”为中介，再生产过程是“间接”的，即父辈地位通过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到子代的阶级阶层地位。也就是说，阶级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的间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春玲（2005）通过对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获得变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指出，在1949年以前，拥有最多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极其稀少的教育机会，而1949年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迅速下降。虽然没有完全割裂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家庭社会资本也降到了最低点。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形势发生了扭转，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调查数据虽然未能证实经济资本影响力的增长趋势，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如今家庭经济条件对子女教育机会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只是受其影响的这一代人还在学校读书。作者认为只是目前收集到的数据还不能反映出经济资本的作用。可见，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机制在教育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张翼（陆学艺主编，2004：108～206）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获得教育地位的高低，主要是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城市化程度三类因素在不同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1978年以后，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作用力，较“文革”时期都有所提高。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自下放锻炼回城后，其子女也得以接受较好的教育。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也能够在高教招生的恢复中为自己的子女创造较好的机会，接受较高等级的教育。自此开始，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就越高（自这一时期开始，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

程度的回归系数值开始上升)。不仅如此,1978年以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力,也超过了“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这预示着“受教育水平”较高但“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自己的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等教育学校招生费用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子女的入学,这表现在地区差距上,就是“14岁时的居住地点”这个变量仍然很显著,即农村的同期群孩子们,仍然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而不能与出身城市的那些同期群的孩子们接受同样的教育。这种不公平,不是个人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是由社会制度的分割状况引起的。李煜(2006)的研究也指出,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三) 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

高等教育在教育分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现代社会,大学已经成为制造社会中间层和上层的主要机器,因此,高等教育的阶层不平等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国内学者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早在高考制度恢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即有学者指出,父亲职业对子女考入高等学校有相当影响,干部和职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较工人、农民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进入90年代以后,有多位研究者对不同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进行了调查。1998年4月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资助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而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逐步升高。根据系统调查资料推算,农民子女与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国家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同时,调查还表明,父亲的职业不仅影响着其子女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小,而且还进一步与其所能够进入的学科密切相关。在高校所谓的“热线学科”专业中,农民和工人的子女的比例低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在“基础学

科”专业中情况则相反。与此相对，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更多地进入了“热门学科”，在一些专业中几乎形成垄断地位。不仅如此，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优势阶层的学生在高考录取上存在明显优势（张玉林、刘保军，2005）。杨东平（2006）对2003年~2004年对部分高校学生和部分地区高中学校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同类层次高校中，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高中阶段教育分层状况的积累和延续。

刘精明（2006）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展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依据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比较了1978年高考恢复以来，高校扩招前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通过事件史分析表明，在1978年~2003年这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城市级别差异、阶层背景差异以及被调查者曾经在高中阶段接受的教育类型差异。就阶层背景差异来说，相对父亲为低阶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而言，其他各职业/教育阶层位置的优势作用都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大约在35%~64%。但相对不同性质区别的高等教育而言，父代阶层背景影响在扩招时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相反变化。在以生存取向为主的成人高等教育领域，相对初等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而言，所有其他各职业/教育阶层子代的相对优势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而且父代职业位置或教育水平越高，其子代相对优势的下降程度也就越大。相反的情形是，扩招以后，父代阶层位置对以地位取向为主的大学本科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变化——优势阶层的相对优势，不是下降了而是在成倍地扩大。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在职业上处于较低阶的位置，但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资本。其子代在获得高等教育时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优势，可以从一个阶层的整体性策略行为来加以解释。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阶层，其内在的地位崛起的心理驱动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它是向优势阶层发出挑战的持久动力。这种挑战的成功依赖于两个方面的条件：其

一，某种资源或机会分配中的排斥性是个体主义的而非整体性的，即机会的排他性封闭不能是针对某个具体社会阶层，而至少在形式上应该是公平的、针对任何个体都是一致的筛选标准；其二，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群体有能力达致这一基本的筛选标准。由于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的选择标准以学业成绩为核心，1978年恢复以来的高考制度尽管招致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种制度在保证教育选择的公平性方面的可靠性仍然是其他选择标准所无法替代的，这事实上为下层群体实现地位崛起的梦想提供了形式上的条件。同时，相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各职业阶层来讲，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更好的文化资本条件。由于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水平的因素主要来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因此，相对职业位置或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资本而言，与文化资本关系更为直接的教育水平因素对子代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就更为重要。当这种文化资本被集中运用于子代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从而促使子代达致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筛选标准（学业成绩）的时候，它比其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或政治资本能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因而更容易使自身优势最大化。因此，如果各阶层积极调动自身可及的各类资源来竞争一个社会内部的优势资源与机会，以求效用最大化，并以此作为一个阶层的基本策略行为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这种下层精英向上流动的明确轨迹了（刘精明，2006）。

通过以上的解释，刘精明（2006）表明，文化资本在父辈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人身上转化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家庭积累的阶层上升流动的惯习，这种惯习与高考制度的学业相关机制一致，并参与了阶层上升流动的制造过程。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在于挖掘这种阶层流动的内在驱动因素，从家庭资本转化和教育过程来把握个体是怎样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策略化手段内化这种阶层驱动力的。可以说，本文是截取高中这个教育阶段，去发现影响个人教育获得过程的阶层因素，这也是对高等教育与阶层不平等关系研究的深化。

三、教育获得的阶层背景：一项全国性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上对国内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作为一种